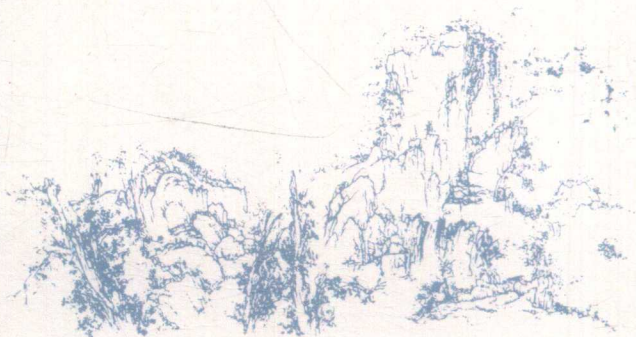


鮑琦亭文集選注

(清)全祖望 原著

黃云眉 選注



黃云眉著作集

海外書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鮚埼亭文集选注

(清)全祖望 原著

黄云眉 选注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8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鲇埼亭文集选注 / （清）全祖望原著；黄云眉选注.
—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
ISBN 978-7-100-15968-5

I. ①鲇… II. ①全… ②黄… III. ①古典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清代 IV. ①I214.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54517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鲇埼亭文集选注

（清）全祖望 原著

黄云眉 选注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三 河 市 尚 艺 印 装 有 限 公 司 印 刷
ISBN 978-7-100-15968-5

2018年8月第1版 开本 640×960 1/16
2018年8月第1次印刷 印张 30 1/2

定价：80.00 元

前言

一、全祖望的略史

全祖望，字绍衣，号谢山。鄞县人。生于清康熙四十四年（一七〇五），卒于清乾隆二十年（一七五五）。

祖望四岁就塾，父名书，亲课以四子书诸经，便能粗解章句。稍长，兼读《通鉴》、《通考》诸书。

康熙五十七年（一七一八），祖望年十四，从里中董正国读书于张氏的三馀草堂。正国是一位最持崖岸的老先生，同学们都不敢亲近，独祖望常常提出经史上的诸问题和正国争论，正国说：“这是我门下的俊人。可惜我已老，不能看到他的大成了！”

是年，补博士弟子。谒学宫，看到乡贤名宦诸祠中有着谢三宾、张杰的神主，便发怒把它们投入泮池里，说：“这些人是反覆卖主的乱贼，怎能让他们玷污宫墙！”

十六岁，应乡试，拿着自己所作的古文去见黄宗羲的弟子查慎行，慎行很器重他，称他为刘原父一流人。

二十五岁，督学王兰生，选祖望充贡。次年，入京师，上一札子给方苞，对方苞所著的《丧礼或问》，提出不同的意见，苞很感到惊异，祖望的声誉也就从此大起来了。

二十八岁，顺天乡试中式，内阁学士临川李绂看到祖望的行卷，许为深宁、东发以后的一人。

祖望应春试下第，将归，李绂固留祖望应词科，工部尚书仁和赵殿最荐之。绂所居是在宣武门南首的一所故相国的房子。房子的西首，有一室叫紫藤轩，住着南昌万承苍，祖望住在东首的一室。三人在那里，或讲学，或考据史事，或分韵赋诗，葱汤麦饭，互为主宾。那时应词科的人，还未尽集，李绂对祖望说：“大江南北人才，差不多都是你所熟悉的，请你为我列举之。”祖望便援笔写上四十余人，并各举所长，甲精于经，乙通于史，丙工于古文或诗或骈偶之学。绂看了叹着说：“假使朝廷能恢复前代通榜的制度，你真是无愧退之啊！”（韩愈有《与祠部陆员外书》，荐侯喜、侯云长、刘述古、韦群玉、沈杞、张弘、尉迟汾、李绅、张后余、李翊等，见《昌黎集》卷一七）

乾隆元年（一七三六），祖望三十二岁，再应春试，始成进士，入庶常馆。初见江阴杨名时，名时称祖望读书之博，同时鼓励他从事于有用的学问，祖望惶恐地说：“祖望怎敢言博！像东莱、止斋的学问，朱子还要议他们，何况祖望！”名时说：“你能见到这点，便已进步了。”

是年，祖望和李绂共借读《永乐大典》，把那些欲见而不可得见的书，分“经”、“史”、“志乘”、“氏族”、“艺文”为五类，每日各读完二十卷，并于其中佣钞了不少仅有的书。

那时张廷玉当国，和李绂不相能，而祖望和绂最相契合，廷玉因并恶祖望。怕祖望又选上了词科，便特奏：“凡经保举而已成进士、入词林的人，不必再参加鸿博之试。”于是识者预料祖望的馆职也不会久了。果然，次年散馆，置祖望于最下等，归班以知县用。祖望不乐，因归里。而和祖望同应词科的钱塘厉鹗，以违式报罢；山阴胡天游，以次年补试时，鼻衄大作，也报罢。所以祖望友人杭世骏叹着说：“是科征士中，吾石友三人，皆据天下之最，太鸿之诗，稚威之古文，绍衣之考证，近代罕有伦比，皆不得在词馆，岂非命哉！”

三年，祖望三十四岁，丁父忧；四年，三十五岁，又丁母忧。既毕葬，闻李绂主试江南；因往金陵见绂。绂以病故，神形困悴，对

祖望絮语谆谆而没有条理；但仍为祖望商讨古人出处的道理。祖望呈诗五首，末首说：“生平坐笑陶彭泽，岂有牵丝百里才，秣未成醪身早去，先几何待督邮来！”从此不再打算做官了。而祖望此时还只三十七岁，生计渐成问题，有时连饔飧也不能给。

十三年秋，祖望往主戴山书院讲席，一月以后，学者云集，学舍至不能容。但以郡守对他有些失礼的地方，便拂然辞职归里。次年，学者五百余人，在那里寄食以待开讲，祖望终坚决不就。

十五年春，祖望害了重病，一目忽眚。归安姚世钰说祖望“不善持志，理会古人事不了，又理会今人事，怎能不害病！”

十七年，往广东，主端溪书院讲席。旧病复发。次年归里。又次年，往扬州马氏畬经堂养病，那里有一个叫朱重庆的人，即所谓“东城狂士”者，照顾祖望很殷勤，每日来看祖望的病，不少间断。（见焦循《雕菰楼集》卷一八《书〈鲒埼亭集〉后》）十一月归家。

二十年，子昭德病歿，祖望因过于悲恸，自己的病也愈不可支。到了七月，这位辛勤一生的学者，便溘然与世长别了！年仅五十一。家人出所藏书万卷，才易得二百金购备葬具。

以上为全祖望一生历史的概述，是我根据祖望《文集》中《万承苍墓碑铭》、《赵昱诔》、《董正国墓版文》、《查慎行墓表》、《杨名时行述》、钱肃乐《崇祀录跋》和《诗集》中的一些自注文，并参考祖望弟子董秉纯的《年谱》而缀成的。其在《清史稿》和《清史稿》以前各书所有的全祖望传文中，乃至若干关于祖望部分历史的记载中，都还找不出比上文更为重要的资料，所以这里不再胪引。

二、全祖望的著述

全祖望的著述，根据《文集外编》董秉纯题词的话，是有三十余种，而在今日可以看到和可以知道的，不过二十余种。其散佚的稿，连秉纯也不能举了。唯祖望重要的著述，差不多都有了刻本。兹简单

地介绍如下：

《鮚埼亭文集》三十八卷 有余姚史梦蛟校刻本。按《年谱》说，祖望临歿，以《文集》五十卷寄给扬州马氏丛书楼，后归祖望友人杭世骏。此本原稿虽然从杭氏得来，却少了十二卷，徐时栋曾记其事。（《烟屿楼集》）

《经史问答》十卷 这是祖望解答弟子董秉纯等经史疑问的总集。阮氏说此书“实足以继古贤，启后学，与顾亭林《日知录》相埒”。（阮氏《经史问答序》，亦见《揅经室二集》）有史梦蛟重校本。原刻本出杭州万氏。

《鮚埼亭文集外编》五十卷 根据《目录》后的《跋》语，此书为董秉纯所编，同门蒋学镛重加审定，而文辞删润过多，故此书文辞仍以董本为主，篇卷次第，则依蒋本。但《跋》语漏去姓名，无从知道刊者为谁，钱泰吉《曝书杂记》已这样说，张之洞《书目答问》，也只说别一人刻。《四部丛刊》所据即此本。

《鮚埼亭诗集》十卷 有慈溪郑尔龄刻本。《四部丛刊》所据，为无锡孙氏小绿天所藏旧钞本。又《遗诗》一卷，为光绪端溪书院所刻。

《句余土音》二卷 这是祖望和诗社同志搜存“粉社掌故”的诗集。按祖望序，是诸同志诗的合集；此书为董秉纯所编，仍是《别集》。有张氏适园刻本。陈铭海曾为之补注，成《句余土音补注》六卷，为吴兴刘氏嘉业堂所刻。

《读易别录》 收入鲍氏《知不足斋丛书》。

《汉书地理志稽疑》六卷 有歙人朱文翰刻本。粤雅堂本、《二十五史补编》本，所据即此本。《四明丛书》本，则为粤雅堂本据王氏钞本校刻者。朱序以鄞郡一条为例，证明此书考证的精到，甚确。

《宋元学案》一百卷 这是祖望续补黄宗羲、百家父子编纂未成的书。续补的分量，约十之六七。体例比《明儒学案》为完整，态度也更客观。此书为王梓生、冯云濠，根据宗羲后人补本，及卢镐、蒋学镛等所藏祖望的底稿，相互参订而成。初刊者为冯云濠，不久，其

版被毁，由何绍基集资重刊。

《七校水经注》有无锡薛氏刻本。祖望借读《永乐大典》，仅及平韵，《水经注》收入上声水字，已在一万一千卷以外，故此书不曾据《大典》参校异同（董沛《例言》），但此书“剖别《经》注，改易次第，采诸家之长，补原文之佚”（薛福成《序》语，亦见《庸盦外编》），经七校而后成，工力的深厚，可以想见。

《三笈困学纪闻》祖望于乾隆六年（一七四一）成此书，七年便有金氏刻本。一般认为祖望所笈，实在阎若璩、何焯二家之上，故余姚翁元圻注《困学纪闻》尽录入之。

以上十种书的刻本，都是较流行的。

祖望辑《续甬上耆旧诗》七十卷，《国朝甬上耆旧诗》四十卷，见《外编题词》。《年谱》则作一百六十卷。蒋学镛《樗庵存稿》、《续耆旧集题词》作八十卷。《题词》曾说到祖望辑此书时，“遍求之里中故家及诸人后嗣，或闷不肯出者，至为之长跪以请之”。这种恭敬桑梓，发扬幽潜的精神，多么令人激动！但我还没有看到此书的刻本。其余如《公车征士录》，最先刻，也未见（《外编》有祖望《自序》。唐鉴《国朝学案小识》作《丙辰公车征士小录》）。而《天一阁碑目》（《外编》有记）、《读史通表》、《历朝人物亲表录》（《外编》有自序），及《沧田录》、《四明族望表》、《双湖志》、《四明洞天旧闻》、《年华录》（此书名，见孙殿起《贩书偶记》卷一五〇）等书有没有刻本或稿本，更无从悬测。不过分量都不大，重要性也较差了。

阮元说：“经学、史才、词科三者，得一足以传，而鄞县全谢山先生兼之。”又说：“吾观象山、慈湖诸说，如海上神山，虽极高妙，而顷刻可成；万（指斯大、斯同等）、全之学，则如百尺楼台，实从地起，其功非积年工力不可。”（《经史问答序》）可见全祖望是一个对经学、史学、文学都支付了大量劳动的卓绝的学者。他的大部分著述，能博得当时和后人广泛的好评，应该不是偶然的事。

全祖望的学问是多方面的，但他不像清代其他有些学者一样，为

学问而学问。他的学问有它的总的方向，那就是通过他对经学、史学、文学的大量劳动，来发见、继承、光大中国前代具有一定价值的学术遗产，特别是来发见、继承、光大中国传统的优秀的民族品质和民族精神。所以全祖望的学问，又是统一的，不可分离的。

我在这里准备向读者介绍的全祖望的学问，是仅仅限于全祖望的文学，即限于祖望《文集》的一部分作品，但可以说是祖望心血集中的部分，也可以说是祖望学问集中的部分。而祖望的学问，既有它的总的方向，又有它各部分之间内在的统一性和不可分离性，那么，先把祖望全部分的著述作一简单的介绍，对于读者了解祖望文学，肯定是有有所帮助的。

三、全祖望的时代和全祖望文学主要部分——表彰明季忠义的关系

全祖望文学的主要部分，是《文集》中大量的表彰明季忠义的文章。要不要肯定这些文章在文献上的重要性，实际上也就是要不要肯定明代末年民族保卫战争在历史上的必要性。这就不能不关系到我们今日应当如何对待历史上的民族矛盾的问题。我们不能否认我国是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国家。正因为如此，今日党的民族政策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对待历史上的民族矛盾问题，则应根据历史发展的观点，做出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处理。毫无疑问，站在大汉族主义的立场上，过分夸大汉族以外的各族的落后性，过分夸大他们在经济上与文化上的消极作用是错误的。但同时我们也不能否认，当历史上一个较落后的民族的统治阶级，向一个较进步的民族进行侵略战争的时候，被侵略的民族起来抵抗，进行自卫，不仅在战争的性质上是正义的，而且在客观上还具有保卫先进经济基础及先进文化的进步意义。因此，如果不肯定这种民族保卫战争，也同样是错误的。从这样一种认识出发，我们就不能不肯定明代末年民族保卫战争在历史上的必要性，自然也就不能不肯定全祖望文学的主要部分——表彰明季忠义

的文章在文献上的重要性。

明代末年的抗清战争，不仅具有上面提到的这种进步意义，并且比别个时代的民族保卫战争还具有一种新的进步意义。这主要是指在明中叶以来到明末为止这一时期的经济状况，有了新的因素，即在旧的封建社会中产生了新的资本主义萌芽的因素。因而从文化学术上的成就来看，这一时期也放射出了过去未有的光彩，如方以智的《物理小识》及其他著作，在当时所能达到的自然科学的较高水平上，阐发了不少接近唯物主义的理论，而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则更大胆地提出了含有强烈的民主主义因素的政治见解。所以，在社会性质的关键问题上，我们说明末的抗清战争，比别个时代还具有新的进步意义，这应是无可置疑的了。

明代末年抗清战争的力量，主要是汉族人民的力量。而战争的领导人物，则大部分是东南沿海资本主义萌芽迹象最显著的江浙，尤其是浙江的地主阶级或者兼营工商业的地主阶级的代表。诚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们的民族意识不可能没有一定的大汉族主义的因素，但是，我们绝不可以因此就否定他们所领导的抗清战争的历史进步性。应当看到，抗清战争是极其复杂和艰难的，不仅要向满族统治者和汉族投降派结合的新政权展开斗争，还得向南明政权中占据优势的汉族投降派展开斗争（这种斗争实际上就是甲申以前东林党和阉党斗争的继续）。显然，这两种以反对异族统治者侵略为目的的斗争，都是有利于历史的发展，而不是阻碍历史发展的。可以认为，这是我们在分析明末的抗清斗争时所应该坚持的历史的辩证的观点。

抗清战争是失败了，但抗清战争的精神并没有随之被消灭。这从清代康、雍、乾三朝统治者对待汉族知识分子的各式各样的政策上可以清楚地看到。现在，请进而述全祖望的时代和全祖望文学主要部分——表彰明季忠义的关系：

清代康、雍、乾三朝，可以说是清代统治者一贯企图压制消灭汉族知识分子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气节的时代，他们的修各种官书，特

别是大规模地修《明史》，修《四库全书》，以及连续不断的文字狱，都是清代统治者用威胁利诱，双管齐下的手段，来实现这种企图的证明。全祖望所处的时代，恰恰是这个难乎其为知识分子的时代。而在这个时代里的江浙，尤其是祖望故里所在的浙江的知识分子，感到特别为难。清代统治者，为了庄廷铨，吕留良、汪景祺、查嗣庭等文字狱的迭兴，对浙江知识分子的歧视是加深了。到了高宗晚年，这种歧视，已发展到最后阶段。汉族知识分子，和汉族文献的命运，普遍陷入悲惨之境。自乾隆三十九年（一七七四）至四十八年（一七八三）间，文字狱多至数十起，而和这些连续不断的文字狱伴随而来的，就是大量的所谓违碍文字的销毁。不消说，其中最悲惨的，依然是世宗早已斥为“风俗浇漓，人怀不逞”（《东华录·雍正七年五月谕》）的浙江。浙江奏缴应毁的书，独过他省，十年之间，竟至一万三千八百六十二部之多（《咫进斋禁书总目》卷首），造成了浙江的文献空前的不可弥补的损失。

清代统治者的这种对汉族知识分子的统治政策及其企图，都是身经康、雍、乾三朝，而又籍隶浙江的全祖望所耳闻目睹，并且能十分深切地理解到的。那么，为个人安全计，祖望应该十分警惕地和当时已经大量产生（主要因于这种统治政策）的考证学者一样，绝口不谈政治，整天伴随着尘封蠹蚀的故纸，搞他的考证工作。像他所优为的《七校》、《三笺》之书的纯考证工作，尽管对于当时的一般的浙江知识分子来说还难免吃惊担慌，而他个人，总可以赢得魂梦不扰。何况考证的气氛，跟着这种统治政策的加紧施行而愈趋浓厚的情况下，像祖望的无逊于当时第一流考证学者水平的《七校》、《三笺》及其他考证文章，谁都知道是可以弋取高名而有余的。可是祖望没有这样做。他的一生心血的集中点，不在于《七校》、《三笺》，而在于描塑并歌颂那些抗清组织中前赴后继的杰出人物，即所谓表彰明季忠义的文章。这种文章，在当时，尤其在当时的浙江，显然是会招致不测的。

固然，我们可以这样说：高宗朝的修《四库全书》，和高宗对汉

人著作的那种苛刻的挑剔，是在祖望死了快近二十年之后；而圣祖朝的修《明史》，只是统治者笼络那些不入科举之彀的明代遗老的一种手段。祖望的表彰忠义，也只是《明史》的一种补充工作，或者是稗野的纠正工作。他没有借此攻击新朝，相反地，他可以把表彰故国忠义，说成为新朝服务，因而祖望的表彰忠义的文章，不会招致或加深统治者的歧视。但我们应该知道，清代的修《明史》，一方面企图笼络遗老，一方面也企图在《明史》编纂过程中，侦察这些遗老们对新朝的态度；同时也是清代统治者企图压制消灭汉族知识分子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气节的开端。表彰故国忠义，虽然也可以为新朝建立和巩固所谓君臣关系，但这种表彰，实际上有一定限度，过多的表彰，会使新朝吊伐的旗帜，减少光彩；而来自异族的统治主，对这种表彰的看法，自然更不同了。

我过去写过一篇《〈明史〉编纂考》的文章，其中有一段话，说明了清代统治者的修《明史》，尊重公论是表面，箝制公论是实质。而特别使史臣感到含毫惶惑的，是明清之际抗清战争的史料的取舍。本来这些战争的史料的取舍，应该决定于《明史》本身——内容或体制的客观要求，而按其实际，此类较宝贵的史料，大部分都在统治者从民族偏见出发的忌讳下，遭到抛弃或割裂了。《明史》的表彰忠义是很不够的，而《明史》的不能成为信史，这确是一个主要的因素。全祖望虽然没有参加修《明史》的工作，但当高宗践位之初，祖望新成进士，曾移书六通于明史馆，作了若干的建议（《移明史馆帖子》一至六）。在那些建议中，我以为最主要的，是把不仕新朝的隐逸列入忠义的意见。这种意见，在实际没有笔削之权的史臣，可以断言是不会予以接受的。新朝修史，表彰胜国忠义，可以说成为新朝服务，隐逸又何居乎？但在祖望，则确是有他的一种意图。他以为扩大忠义范围，更可以从汉人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气节上，反映出明季抗清力量的不可轻侮，而这种力量的反映，是可以替将来的反清力量的形成，起着鼓吹作用的。

准上所述，全祖望的表彰明季忠义，包括另一形式的忠义——隐逸在内的工作，既不可能通过清代统治者箝制下的《明史》来进行，那就不能不依赖祖望自己的努力来进行了。祖望进行这种表彰工作，为他所最注意的有两件事：第一，克服资料搜集的困难。祖望《墨阳集序》说：“吾乡故国遗民之作，大率皆有内外二集，其内集，则秘不以示人者也。转盼百年，消磨于鼠牙鱼腹之中，虽外集亦十九不传，况内集乎？”又《杲堂诗文续钞序》说：“残明甬上诸遗民，述作极盛，然其所流布于世者，或转非其得意之作，故多有内集。……百年以来，雪摧霜剥，日以陵夷。”由于忌讳而消磨陵夷，像内集之类的访问的困难，只是百年以来搜集明季忠义资料上困难的一种。如果祖望不能克服资料搜集的各种困难，表彰工作，是没法做，当然更是没法做好的。第二，避免文字表面的触忤。祖望除了用分散写，不集中写的方式，即不写专书，单写碑传之类的文章的方式，以表示他的表彰工作，没有一定的目标外；还可以在他的各篇文章中，概括出如下的解释：（一）不掺入华夷之见，单从君臣关系上，说明胜国忠义，也是兴朝应该亟予表彰的对象；（二）把元遗臣，说成和明遗臣一样；（三）对兴朝说，往往把忠义事迹，归结为精卫填海，夸父逐日的愚诚；（四）强调一隅的顽抗，无害于同轨毕附，采薇的苦节，无害于应天顺人；（五）认为皇朝再世宽大，吠尧之嫌，尽在蠲除，忌讳是不必有的事；（六）缩小表彰的作用，往往把它说成《明史》的补充，稗野的纠正。祖望的这些解释是必要的。没有这些解释为之掩护，根本就谈不到进行这种表彰工作。

然而我以为：在祖望的时代，祖望这样做，还是有它的危险性的。首先，雄狠多猜的高宗，看到祖望大量的表彰明季忠义的文章，可能会透过祖望的解释的烟雾，发现祖望文章的实际的意图。其次，祖望一生伉直，臧否人物，少所假借。既不齿钱谦益于人数；又对伪装的理学名家李光地，悍然揭露其所谓三案（卖友，夺情，以外妇之子承祧）的劣迹；而撰《萧山毛检讨别传》，肆笔讥弹，铺张至数

千言，严元照所谓“自修史立传之外，古来未有专作一文以攻讦人之过恶者”（评阅《外编》语）章学诚也以为攻之太过（见《文史通义·浙东学术》），则祖望开罪的人，必然不在少数，万一让吴之荣其人（庄廷铨狱的举发者），看到祖望这样壮烈悲痛，洒遍热血的文章，难道不会把它们说成和庄廷铨的《明史》一样，而作为自己的起复之资吗？因此，我以为祖望表彰忠义的文章，其终于不遭危险，主要还不在于祖望自己的解释，而在于祖望的文集遗稿，董秉纯向杭世骏索之再三而不应，沉沦既久，才躲过了一个文字灾祸的最可怕的时期，这是一种莫大的侥幸。如果祖望的文集，能在高宗未死以前，公然流布人间，则毁版非绝不可能的事，而董秉纯所谓可为长恸者，恐在此不在彼了。那么，祖望虽然作了这些必要的解释，他的敢于表彰明季忠义，无疑，还是由于他的高度的爱故国爱民族的感情的积极鞭策。

祖望的表彰文章，影响了晚清一部分革命者的反清情绪，也就是说，在晚清反清力量的形成上，起了一定的鼓吹作用，这不仅过去已有些人这样说，我们在今日也是可以这样说的。但可能又有人认为，祖望的表彰明季忠义，在晚清反清力量上所发生的影响，不过是客观效果，而不能说是祖望主观意图的实现。祖望壮年成进士，入词林，同时还续娶了一位满宫的女儿（袁枚《随园诗话》卷六：谢山年三十六，娶满洲学士春台之女，逾年举子。按《年谱》，祖望前娶张孺人。三十岁，续娶曹孺人于京师，不是三十六岁），虽然后来不再图仕进，但到底没有把清廷的俸禄，当作蝼蛄之肉。他是一个清代士大夫，既不可能和当时人民的反清运动相结合，而又生当清代盛时，上不及挽落日，下不及迎晨曦，似乎可以说，他对清代统治者的愤恨没有存在的可能。然而我认为，只要我们不否认清代康、雍、乾三朝，是清代统治者一贯企图压制消灭汉族知识分子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气节的时代，我们也就不能说，这个时代的汉族知识分子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气节，已全都烟消灰灭。高宗晚年数十起的文字狱，虽然一部分出于统治者及其帮凶们的苛刻的挑剔，但也不能说全都是莫须有

的狱。一部分的汉族知识分子，尤其是浙江知识分子，是会把他们的反清情绪形之于文字的。那么，像一生淡漠于仕进，而独汲汲于表彰明季忠义的浙江知识分子全祖望，偏说他对清代统治者没有愤恨，这样的看人，不是太表面、太片面了吗？因此，我在这里还是要强调我的意见，祖望这些表彰文章的客观效果，应该说是祖望主观意图的实现。并且我认为，祖望这些文章的思想性，这些文章的现实意义，恰恰是体现在祖望的这种意图上，以及这种意图的实现上。如果把它们的作用，局限于《明史》的补充，稗野的纠正，便会减少、甚至抹杀了它们的现实意义的成分。

以上说明全祖望文学的主要部分，即表彰明季忠义部分的优秀作品，居然能通过祖望的这个可怕的时代，完成了他的对故国对民族的任务，而没有和其他大量的作品，一样遭到秦火的灾祸，这是一件值得我们庆幸的事。

最后，还得附带说明一下：

在民族斗争过程中，阶级斗争往往服从于民族斗争的需要。这主要表现在爱故国爱民族的人民一方。李定国等的从农民起义转入抗清战争及其在战争中的光辉业绩，就是最显著的例子。但民族斗争的领导人物，他们虽然可以在民族斗争上，表现出高度的牺牲精神；但由于阶级的局限性，他们对农民起义，依然是敌视的。他们把农民起义当作“犯上作乱”，称为“流贼”“流寇”。他们认为“犯上作乱”，对国家危害的严重，不次于异族的侵略；甚至认为不安内不能攘外，把镇压农民起义放在民族保卫战争的前面或主要地位。所以他们认为：为抵抗异族侵略而牺牲，是忠义；为镇压人民的“犯上作乱”而牺牲，也是“忠义”。在历史上，所谓忠义列传，除了那些在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尖锐到不能不易姓的关头上，甘心为故君舍生的忠义外，大部分就是为这两种斗争而牺牲的人物。这种站在地主阶级立场的看法，自抗金的岳飞，以至抗清的史可法，都没有例外。而全祖望对待忠义的看法，基本上也是没有两样的。在他的张肯堂《神道碑》及朱

大典、李长祥等《事状》中，都说到镇压农民起义的业绩；而二千余言的大典《事状》，述镇压事竟至八百言之多。又在林时对《事状》中，也反映了对李自成的仇视，如叙时对晚年观剧踏地事说：

一日，至湖上圣功寺巷中，公眼已花，不辨场上所演何曲，但见有冕旒而前者，或曰：“此流贼破京师也。”公即狂号，自篮舆撞身下，踏地晕厥，流血满面，伶人亦共流涕，观者迸散，是日为之罢剧。嗣是公不复出，掩关咄咄而已。

可见祖望的表彰明季忠义，虽然主要是以民族保卫战争为范围，但也包括镇压农民起义在内。这是祖望地主阶级本质的反映，也是祖望受当时历史条件限制的结果。所以，我们对祖望也不能独加苛责。不过，我们如果能指出，由于祖望的阶级局限性，他只能片面地表彰抗清战争的领导人物士大夫的忠义，而难能认识人民以阶级斗争服从民族斗争需要的更珍贵的民族品质和民族精神，在抗清战争中所起的重大作用，这对于明代末年民族保卫战争的整个力量的估计是有好处的。

四、全祖望文学的特征

全祖望文学的主要部分，即表彰明季忠义部分的作品，我在上节已介绍了一个大概。实际上，也等于介绍了祖望其他的文学作品的大概。我说过祖望学问的总的方向，是在发见、继承、光大中国前代具有一定价值的学术遗产，特别是在发见、继承、光大中国传统的优秀的民族品质和民族精神。祖望大部分的文学作品是属于后者，而表彰明季忠义，是后者的主要部分。我既把祖望文学的主要部分的现实意义，作了必要的分析，则祖望其他的文学作品，也就可以类推了。

本节主要在说明全祖望文学的特征。首先，我们要清楚，祖望这

种文学的特征，不是祖望个人的特征，而是浙东学者共有的特征，祖望不过表现得更突出而已。

我们可以肯定，祖望是一个经学、史学、文学都具有高度水平的学者。但我们知道，当时浙东学术的风气本来是这样：不管这三种学问，在某些学者的水平上彼此不同，或者个人的水平上也彼此不同，而作为浙东学者一般的要求，即对每一种学问，都得有一个实际内容的要求来说，他们会很自然地把这三种学问陶冶在一起，同时也会很自然地使他们的史学的表现，比之经学、文学显得更突出。在他们的经学、文学上，都体现了他们的史学的最基本的精神，不离开实际的生活政治，而为生活政治服务。在这种风气的激荡下，于是浙东史学，便成为中国史学一面鲜明的旗帜。这是清初以来浙东学术上的一个特征。祖望就是这种学术风气激荡下产生的一个学者。虽然他的学问水平，比之一般浙东学者为高，而他的学问的特征，还是和浙东学术上的特征分不开的。

再进一步说，创造这种浙东学术风气的人，为余姚黄宗羲，而祖望，则一般认为是宗羲的私淑者。宗羲学问的广度与深度，固非祖望所能企及，而祖望的步趋宗羲，实过于万氏兄弟。斯大最专于经学，斯同最专于史学，而致力文学则较差；祖望除经学、史学外，对文学也一样致力，所以祖望的学问，和宗羲学问的风貌，最为相似。祖望说宗羲“以濂洛之统，综会诸家：横渠之礼教，康节之数学，东莱之文献，艮斋、止斋之经术，水心之文章，莫不旁推交通，连珠合璧，自来儒林所未有也”。（《梨洲先生神道碑文》）这是宗羲统经史文为一的学问的风貌，也就是祖望替宗羲学问做了一个毫不夸大的总结。宗羲讲学于越中，于甬上，于海宁，大江南北，从者骈集；而光明俊伟的高弟，多出于甬上，这些高弟，又都率其子姓以从，像汉人所谓门生者（参阅《梨洲先生神道碑文》、《万循初墓志铭》、《陈南皋墓志铭》、《甬上证人书院记》），因而通过宗羲统经史文为一的崇实黜浮的指导，浙东学术，蔚然成为一种前此未有的新风气。祖望虽